

# 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地区的人类迁徙与文化交融研究\*

金洪培 冯英盾

**内容提要** 汉代以前,华北地区部分华夏族已开始向东北辽河流域流动。以公元前3世纪末燕国东扩为分水岭,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箕子所代表的殷族集团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改变了以貊族为主的辽河流域各族群的政治、文化面貌;在后一阶段,即公元前3世纪末燕国东扩之后这一段时期,以辽河流域以及如今的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等局部区域成为华夏族大举迁徙的目的地,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面貌。

**关键词** 汉代以前 华北 东北 人类迁徙 文化交融

有关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诸族群的迁徙与文化交融情况的研究,目前学界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学领域的考证上,与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对华北与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文化关系、族群关系、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族群文化形成较为基础的认识。其后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夏商时期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的族群、文化交流关系,“箕子朝鲜”的形成、迁移过程以及殷人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全燕、秦朝时期华北地区居民的迁徙情况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期对汉代以前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族群交融情况有一个较为客观、系统的考察。

## 一、新旧石器时期东北亚局部区域人类文化流布情况

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局区域早在旧石器时期就有了人类活动痕迹<sup>①</sup>。我国东北地区史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主要分布情况:辽宁本溪庙后山旧石器遗址距今40万年,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营口金牛山旧石器遗址距今约28万年。黑龙江有哈尔滨顾乡屯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遗址;吉林有安图人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3万至2万年),抚松枫林村、青山头(距今1万多年)等旧石器晚期遗址。在长白山地区还陆续发现了和龙大洞、石人沟,抚松新屯子西山、枫林等旧石器晚期遗址。此外,辽宁还发现了海城仙人洞(距今4万至2万年)、凌源西八间房、凌海沈家台等多处旧石器晚期遗址。

从语言学以及遗传学角度来看,历史上的东北亚区域存在着一个由我国东北经朝鲜半岛向日本的人口流动过程。语言情况较为复杂,有些学者将朝鲜语与日语划归“阿尔泰语系”,但争议较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在朝鲜半岛的郡县统治及其兴衰”(22BZS024)阶段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朝鲜半岛旧石器时期遗迹分布图可参考〔韩〕韩永愚:《历史拾遗》,坡州:经世院,2011年,第60页。

大,语族、语支也没有定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今天的朝鲜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基因差异为5%,与日本人只相差4.2%,与欧洲人则相差58%。<sup>①</sup>血缘相近的族群往往容易建立紧密的关系,而族群边缘又通常与其他邻近族群边缘互相交往、交流,如此便发生了基因的缓慢差异化过程。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基因相似度的递差关系所反映的方向性也与泛欧亚语系的传播方向一致,同时,这种传播也是一个持续且缓慢的过程。

东北历史上存在的东胡、肃慎、夫余—秽貊三大族系,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石器文化从外兴安岭至辽河流域均有分布,如黑龙江地区有密山新开流文化(距今7500—6500年)、齐齐哈尔昂昂溪文化(距今4500—4000年)、宁安莺歌岭上层类型(距今3000年左右)等;青铜时代有肇源白金堡宝文化(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铁器时代有友谊风林古城文化(魏晋时期)。吉林新石器文化遗址左家山上层文化(距今5500—4500年)、左家山中层文化(距今6500—6000年)、左家山下层文化(距今7500—7000年);东部有金谷类型文化(距今4500—4000年);青铜时代的遗址约有600余处。辽宁新石器文化有小河西(距今9500—8400年)、沈阳新乐下层文化(距今7500—6500年),距今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是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57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代表了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距今5300年以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陆续进入了中国早期文明阶段,西辽河流域是中国早期古文明的三大核心区域之一,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新石器前期早段(约公元前6000年至5000年),半岛出土陶器有三个系统,分别是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鸭绿江流域压印纹系统、图们江流域的压印点列纹系统,以及洛东江流域的堆纹系统,皆属于“外来文化”。<sup>②</sup>而到了前期晚段(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朝鲜半岛中东部海岸区域还开始出现图们江流域与洛东江流域南北陶器文化的交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此一时期朝鲜半岛东北与东南地区部落民在中东部海岸地区的交往、交流导致的。与此同时,朝鲜半岛西北部则不受这种现象影响。

朝鲜半岛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一种文化地域分割现象,与半岛的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半岛北起长白山南至智异山有一条岛内最高且最长的山脉脉系,在半岛地形上从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元山市开始贴着东海岸由北向南,在今韩国江原道太白山处折而往西南方向延伸,使半岛东北部与东南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拥有一个独立的水系——洛东江。此脉系西面有密集的小山脉,大体横亘在南北通路上,且集中在半岛中部,这使得此脉系以西南北陆路交流受阻。整体而言,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势平坦,与辽东地区自然地理特征类同。这种特殊的地势环境是朝鲜半岛早期在族群、文化方面呈现多样性的客观因素。

到了新石器文化中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受中华文化影响,朝鲜半岛中西部开始出现刻划纹陶器系统,并逐渐蔓延至朝鲜半岛全境。<sup>③</sup>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朝鲜半岛不同区域内刻划纹系统彼此间的族群联系。从新时期遗迹分布<sup>④</sup>来看,主要集中在鸭绿江下游地区、大同江地区、汉江地区、洛东江下游地区以及西部、南部沿海地区,甚至西部沿海岛屿上也有新石器遗迹分布。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就依靠漂浮等手段在朝鲜半岛西部沿海进行广范围的活动,还有待考证。

① 《亚洲人类遗传多样性图谱》,载《科学》第326卷,总第5959期,2009年12月11日。

② 金象晕:《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及谱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63页。

③ 金象晕:《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及谱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63—164页。

④ [韩]韩永愚:《历史拾遗》,坡州:经世院,2011年,第64页。

不过从文化类型间彼此存在差异这一点来看,朝鲜半岛该时期各个区域间的交流还不够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上的人类文明与其他地区毫无关联。韩永愚就指出,咸镜北道清津农圃里、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里、京畿道富川市、江原道春川市校洞等地发现的公元前 2000 年的新石器末期陶器的形制,就受到中国河南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的影响<sup>①</sup>。

随后在汉江流域新石器晚期江原道春川市内坪遗址(公元前 1000 年—前 900 年)出土的左右栉纹陶器与半贯通突瘤形孔列陶器,与图们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半贯通突瘤形孔列陶器也具有关联性。而经过对此一时期孔列纹陶器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存在着由图们江流域向汉江流域传播,又逐渐向更南地域扩散的文化传播路径。<sup>②</sup>这说明在公元前 1000 年,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可能存在着人员往来活动。

新石器晚期朝鲜半岛的文化系统虽然在局部之间有所关联,但不能就此推断此时期在朝鲜半岛存在单一的族群体系。图们江流域人类文明有向汉江流域传播的迹象,不过公元前 10 世纪—前 9 世纪左右,在汉江流域明显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体系。至少有两个文化系统并存,分别是素面陶器文化中角形陶器文化的(京畿道江华郡河岾面)三巨里遗址群和受图们江流域深腹钵形陶器文化影响的(京畿道坡州郡)交河里遗址群,且在首尔市松坡区可乐洞遗址出现了两个系统发生融合的迹象。<sup>③</sup>

新时期时代早期朝鲜半岛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集中在海边或河边,以渔猎为其主要生产活动,人类活动的密度较低,且这种状态存续的时间较长。到了新石器后期,朝鲜半岛原住民才开始向适宜农耕的丘陵地带迁移。这也为日后我国华北及东北地区人口向朝鲜半岛迁徙提供了广阔空间。

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与我国东北辽河地区同属一个文化区域的特征就已经显现出来,在随后的青铜器时期乃至铁器时期等相当长的时间,朝鲜半岛西北地区一直扮演着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蔓延的一个重要节点区域的角色。

## 二、商周时期华北诸夏对东北、朝鲜半岛局部地区族群的政治、文化影响

“箕子东走朝鲜”是有关中原向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移民的最早记载。《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也记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sup>④</sup>。除此以外,《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等史书也都记载有“箕子朝鲜”之事。就其规模而言,箕子作为殷商王族,且受封国,随箕子播迁的殷人至少也当以千记。

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意见是以箕子为代表的殷族集团曾首先抵达并落脚在辽西<sup>⑤</sup>,且有可能是今天辽宁省大凌河流域喀左县或者其周围地区。此地曾出土过与安阳小屯形制相同的商代青铜器。<sup>⑥</sup>除此以外,辽宁省喀左县小波汰沟出土商晚期饕餮纹大圆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王畿之外最大的铜鼎,此鼎也存在着跟随箕子一族至此的可能性。而大凌河流域与孤竹国相邻且存在交往

① 约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受中国河南省庙底沟石器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出现了平底,周身为水纹、雷纹、绳纹等动态图案的彩色陶器。代表性遗迹有:清津农圃里、平安南道温泉郡弓山遗址、富川市道、凤山智塔里、春川校洞等。参见〔韩〕韩永愚:《历史拾遗》,坡州:经世院,2011 年,第 62—63 页。

②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25—127 页。

③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30 页。

④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620 页。

⑤ 张博泉:《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载《史学集刊》,1995 年第 1 期。“箕氏于殷末迁来东北,其初地在辽西,今大凌河流域。”(见:《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6 页。)

⑥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载《考古》,1973 年第 4 期。

关系。<sup>①</sup>孤竹国<sup>②</sup>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伯夷与叔齐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耻食周粟终至饿死首阳<sup>③</sup>,是史料中仅见的为商王朝殉道的方国贵族,由此可见孤竹国对商王朝的忠诚度。箕子选择避难至孤竹国身后的喀左地区,这种推断也是最具说服力的。

箕子一族可能到达并初步定居的辽西大凌河流域也可能并非一片空地,或至少其周边有不少当地的土著族群。学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一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族群共存、融合,共同成为古朝鲜基础。<sup>④</sup>就土著的考古文化类型而言,普遍认为箕子所到达的东北地区尚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北方系青铜文化。<sup>⑤</sup>箕子一族最终融入当地土著族群中。有关土著族群的族属,傅斯年曾主张“箕氏卫氏之朝鲜,统治者虽迁自中国,其大部居民中应有不少之秽貊旧族”<sup>⑥</sup>,即认为箕子带领的殷族与秽貊相融合。林沄认为,貊主要是在西周初年活动于大、小凌河一带的古代部族。<sup>⑦</sup>张博泉也认为“箕子以秽貊为本立国”<sup>⑧</sup>。就时间与地点来说,箕子一族与貊相邻、相交、相融的可能性最大。

考古资料也显示,包括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双坨子文化、马城子文化等在内的东北地区的文化面貌,除了自身发展以外,还受到了外来文化介入的影响。<sup>⑨</sup>最为显著的文化面貌的变化就是此一地区琵琶型铜剑的出现。

学界曾认为,最早的琵琶型铜剑与辽东地区上马石上层类型文化有关,据碳十四测年,上马石上层类型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1100年左右。<sup>⑩</sup>不过,随后姜仁旭对此一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琵琶型铜剑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起源于辽西地区的十二台营子文化。<sup>⑪</sup>无论如何,琵琶型铜剑的诞生,至少是在箕子一族抵达辽西的同时或之后的一段时期。这样的时间关联性上,虽然还不能明确箕子一族抵达与琵琶型铜剑的产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具体过程,但可以明确的是,两者在时间轴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前后关系。

公元前9—前7世纪,琵琶型铜剑文化开始向外扩散<sup>⑫</sup>,形成了直达朝鲜半岛清川江流域的“琵琶型铜剑文化圈”,但由于该时期大同江以南地区未能发现与琵琶型铜剑共生的美松里形陶器等生活资料,仅发现了琵琶型铜剑、琵琶型铜矛、扇形铜斧等铜器,因此,大同江流域以南地区被称为“琵琶型铜剑文化影响圈”<sup>⑬</sup>。

① 李学勤:《试论孤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② “孤竹”：“其地应在今河北省东境的卢龙县、迁安县一带。”参见：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

③ 《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3页。

④ [韩]姜仁旭(音)：《古朝鲜的成立和大凌河流域中原青铜礼器的再解释》，载《白山学报》第120号，白山学会，2021年。

⑤ [韩]宋镐晔：《大凌河流域殷周青铜礼器使用集团和箕子朝鲜》，载《韩国古代史研究》第38辑，韩国古代史学会，2005年。

⑥ 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152页。

⑦ 林沄：《说“貊”》，载《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⑧ 张博泉：《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载《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⑨ 赵宾福：《辽西地区汉以前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及文化纵横关系的探讨》，载《边疆考古研究》，2011年第10辑。

⑩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⑪ [韩]姜仁旭：《对辽西地域琵琶型铜剑的考察》，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21辑，韩国上古史学会，1996年；姜仁旭：《对于朝鲜半岛出土琵琶型铜剑的登场与地域性》，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49辑，韩国上古史学会，2005年。

⑫ 由于学界就琵琶型铜剑最先出现的地点分别有辽西说与辽东说两种，因此，有关琵琶型铜剑的传播方向也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以我国学者林沄、翟德芳、朴镇煜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琵琶型铜剑文化在公元前9—前7世纪分别向辽西地区以及朝鲜半岛方向传播（参见[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3页）。而主张辽西起源说的姜仁旭则认为，琵琶型铜剑文化是从辽西经辽东传向朝鲜半岛的。（参见[韩]姜仁旭：《对辽西地域琵琶型铜剑的考察》，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21辑，1996年；姜仁旭：《对于朝鲜半岛出土琵琶型铜剑的登场与地域性》，载《韩国上古史学报》第49辑，2005年。）本文接受相对严谨的辽西起源说。

⑬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7页。另外，考古资料还显示汉江流域琵琶型铜剑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尚不能再往前推及。参见[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1页。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圈的扩大并非一定伴随着单一族群的扩大,因为文化具有超越单一族群的特性,如筷子文化与东亚各族群的关系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判定“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形成就是单一族群扩张的结果,因为早期至少在大小凌河流域还存在着如屠何<sup>①</sup>等其他不同的族群。本文倾向于当时存在一个势力相对较强的主体族群推动了“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形成。

至于为何琵琶型铜剑文化会在公元前9—前7世纪出现扩散现象,除了这一地区族群自身繁衍发展壮大因素外,也不能排除由于西部其他族群的进出而受到了排挤。

从考古资料上来看,辽西地区存在不同文化融合的现象。在公元前10—前9世纪,首先传到东北的欧亚草原“山字脊顶叶矛”文化与稍后抵达中原地区的“南山根式铜矛”文化在辽河流域相遇,“南山根式铜矛”文化遏制了“山字脊顶叶矛”文化发展势头,导致“山字脊顶叶矛”文化未能得到充分发展。<sup>②</sup>在公元前9世纪—前7世纪以后,鄂尔多斯文化也东传到了辽西,不过也同样止步于此。<sup>③</sup>除此以外,还发生过至少周宣王(?—前782年)之前的韩侯受封北国,驱逐貊族<sup>④</sup>,并开发新拓土地之事<sup>⑤</sup>。

韩侯逐貊很可能是因为貊的强大,这可以从公元前10—前7世纪欧亚草原“山字脊顶叶矛”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分别止步于辽西而做出推测。以韩侯逐貊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以琵琶型短茎式铜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向东传播是貊强大的结果,其后的传播可能是貊族发展受挫,向东迁移的结果。<sup>⑥</sup>除了韩侯逐貊说之外,还有“为獯豸所逼,稍稍东迁”说<sup>⑦</sup>,可见貊族在辽西地区与其他若干族群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冲突,导致东迁。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化现象,有必要以箕子为代表的殷族前往大小凌河流域并融入貊族为区分标准,将貊族分为前貊与后貊。殷族对政治文化、武器文化的理解也一并融入貊族,客观上为貊族带来了强盛的局面,这可能是貊族在公元前10—前7世纪出现扩张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且极有可能,殷族就是统治阶级。<sup>⑧</sup>因此,后貊的主要特征就是,与殷族文化相结合产生独特的既不是先前殷族也不是先前貊族的文化,可以称之为后貊文化,这也可能是“箕子朝鲜”<sup>⑨</sup>的

① 王绵厚:《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② 成璟瑯:《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③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④ 林沅也认为韩侯的先祖曾受“王”的命令攻击貊。参见林沅《说“貊”》,载《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⑤ 事见:“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诗经·大雅·韩奕》,长城出版社,1993年,第558页;杨军在分析周设韩侯的目的时认为:“箕侯国受到来自北方貉系各族的威胁,因而更名为朝鲜侯,以示接受周王朝的封号,自认是周王朝的诸侯,以期得到周王朝的保护。周王朝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削弱朝鲜侯国的力量,使周人势力深入东北,于是在东北建立了一个新的诸侯国——韩国。……宣王新建韩国,即命韩侯为北方的诸侯长,授予他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权力,无疑是为了取代原箕侯国在东北各方国中的地位,是借援救之名而行统治之实。但是周宣王的这一举措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韩后更名为韩西,即朝鲜,成为朝鲜侯国的一部分。而吞并韩侯国的正是朝鲜侯国。”(参见杨军:《箕子与古朝鲜》,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此说不无道理,姑且供参考。

⑥ 成璟瑯推测这一人口移动现象或发生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参见成璟瑯:《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9页。

⑦ 《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7页。

⑧ 燕国所击朝鲜有宗周意识,此宗周意识或起自箕子。《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略)”一句,“不臣”说明箕子朝鲜一开始并非周之侯国,但后来箕子又“朝周”说明这种“不臣”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改变。《魏略》又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箕子朝鲜仍是周之侯国,且尊周意识仍然存在。又根据《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所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之内容,可知箕子一族在朝鲜侯国代代相传至灭国。

⑨ 我国学界基本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韩国学界主流意见也不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但是还会有一些否定箕子朝鲜的见解,如宋镐晟就认为箕子一族虽到达过辽西大凌河流域,但并不认为此区域曾存在过“箕子朝鲜”,而是认为被当地的土著戎狄文化给吸收了。参见[韩]宋镐晟:《大凌河流域殷周青铜礼器使用集团和箕子朝鲜》,载《韩国古代史研究》第38辑,韩国古代史学会,2005年,第33页。

主要文化内容。

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9—前7世纪是琵琶型铜剑文化发展壮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充满挑战的时期。从琵琶型铜剑在公元前9—前7世纪向东传播的范围来看,即“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东部边界来看,意味着这一期间享有琵琶型铜剑文化的人群活动范围主要在清川江以北地区。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阶段,随着貊人集团的移动,老哈河流域、辽东北部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辽东半岛南端以及朝鲜半岛移动,而朝鲜半岛也因此进入了以琵琶型短茎铜剑为代表的新阶段。<sup>①</sup>虽然从考古资料上来看,琵琶型铜剑文化载体的族群生活圈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抵达大同江以北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载琵琶型铜剑文化的政治实体的中心也迁移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恰恰相反,与琵琶型铜剑共生的美松里型陶器等生活资料,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仅在大同江以北的地区被发现,这说明此时大同江流域还是具有“后貊文化”特征的人群活动的边缘地区,此时“箕子朝鲜”的主体部分还在辽河流域<sup>②</sup>,这一点也得到了—些史料的印证。

《战国策·燕策一》与《史记·苏秦列传》都记载了“燕东有朝鲜、辽东”一句,而不是“燕东有辽东、朝鲜”,可见迟至燕文侯,即燕昭王以前时期,朝鲜的地望还处于燕与辽东之间的辽河流域。且东汉学者应劭注《史记》所载卫满都王险一句时谈道:“地理志辽东险渎县,朝鲜王旧都。”东晋学者徐广则注释道“昌黎有险渎县”<sup>③</sup>。而故险渎县遗址位于今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境内,正处在辽河流域。由此可见,“箕子朝鲜”的政治中心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由辽西东迁至辽河流域<sup>④</sup>,其势力范围则向东抵达大同江流域。

通过辽东地区墓葬文化的变化,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断,“箕子朝鲜”经历了从弱小到强大,并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渐趋凝聚的过程。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辽东地区、朝鲜半岛西北部以支石墓和石棺墓为主的石构墓葬文化圈逐渐形成。<sup>⑤</sup>墓葬中出土的生活资料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也逐渐趋同,而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弦纹壶、素面钵口壶、横耳罐、叠唇筒形罐、琵琶型铜剑、铜矛等遗物来看,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箕子朝鲜”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活资料。

后貊还受到殷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据《汉书·地理志下》所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可知殷族为貊族带来了礼仪与先进的农业文明。《后汉书·东夷传》也提道:“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结果以后貊为主体族群的“箕子朝鲜”民风民俗为之大变,“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sup>⑥</sup>。

尚白风俗也可能受到了殷族的影响,《礼记·檀弓上》记载:“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淮南子·齐俗训》也提道:“殷人其服尚白。”这一风俗深刻影响了属于受“箕子朝

① 成璟璜:《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

② 韩国学界有箕子一族南下说,如卢泰敦就认为箕子一族到达辽西以后,并未再向东北方向移动,而是南下至今山东省永久定居下来。不过这种主张的论据并不充分。参见〔韩〕卢泰敦:《箕子东来说的事实性与否,通过韩国史来看我们和对世界的认识》,坡州:草色出版社,1998年,第295—303页。

③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第2986页。

④ 琵琶型铜剑的分布范围大体上西到大小凌河流域,西北到老哈河、西拉木轮河流域,北到吉林、长春地区,东边几乎分布到整个朝鲜半岛。(参见林沅:《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琵琶型铜剑向朝鲜半岛的传播晚于在辽东地区的传播,结合公元前7世纪左右“琵琶型铜剑文化圈”的范围,可以判定此时期箕子朝鲜的大致势力范围。另外,《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认为,秽貊的居住地在“非滨之东”,“非滨之东,夷秽之乡”。毕沅(1730—1797)校注说:“‘非’,疑当作‘北’,犹言北海之东也。”而所谓“北海”,指的就是今天的渤海,而“非滨之东”指的就是今天的辽东半岛一带。

⑤ 吴大洋:《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研究——兼论与中国东北邻境地区之比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06页。

⑥ 《三国志》卷三十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2011年,707页。

鲜”影响的扶余。扶余“在国衣尚白”，且“以殷正月祭天”<sup>①</sup>，显示扶余与殷族或存在一定的关系。对于“箕子朝鲜”而言，扶余系可能是受“箕子朝鲜”影响的一个貊族边缘族群，其文化或是受“箕子朝鲜”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我们可以借用“生”“熟”的概念去理解这种文化现象，如《宋史》所载“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sup>②</sup>那样，以相同族群中与其他族群关系为判断基准，可以再将族群乃至族群文化进行分类。基于此类族群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推论，即扶余或是“箕子朝鲜”的亚文化，而日后的高句丽<sup>③</sup>、百济<sup>④</sup>则又或是扶余的亚文化，但是高句丽与百济又基于各自的势力范围分别与华夏、马韩等族群相融合，又逐渐演化为两种独特的文化。

今大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的琵琶型铜剑期的绝对年代相当于公元前8世纪到前4世纪。<sup>⑤</sup>因此可以推测，此地区在此期间或属于“箕子朝鲜”领土范围或势力影响范围的东部。我们可以将大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的琵琶型铜剑期视为研究“箕子朝鲜”国运发展的一个局部标本，如果说公元前8世纪这一区域开始出现琵琶型铜剑文化是“箕子朝鲜”向东移动的结果，那公元前4世纪此一地区琵琶型铜剑期的结束，则有可能意味同一政体下铜剑工艺的革新，或意味由不同族群间政治势力的变换带来的青铜武器文化的更迭。可以明确的是，琵琶型铜剑期的结束年代与细形铜剑出现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sup>⑥</sup>

琵琶型铜剑向细形铜剑的演变发生在辽东地区，辽东地区由琵琶型铜剑向细形铜剑的转变，即初期细形铜剑出现年代是公元前4世纪前后。而由“初期细形铜剑”发展成为“典型细形铜剑”则在以大同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发生。<sup>⑦</sup>这说明在细形铜剑期，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开始出现文化差异，这很有可能与原本位于辽东地区的政权中心向朝鲜半岛转移、收缩有关。

目前考古学界认为，辽东地区以及清川江以北地区的细形铜剑上限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下限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不过大同江以南地区，细形铜剑的下限年代要晚于公元前3世纪。<sup>⑧</sup>而鸭绿江、清川江流域的细形铜剑期文化中的重要生活资料——陶器，又与琵琶型铜剑期有重叠性<sup>⑨</sup>，说明该地区铜剑形制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此时期该地区的族群发生根本变化。大同江以南地区细形铜剑下限年代的滞后性，除了能说明“箕子朝鲜”的一小部分族群存在一个继续向大同江以南迁移过程以外，还说明在大同江以南地区文化更替也存在滞后性。

整体说来，辽东地区细形铜剑的出现与燕国等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在燕国影响半岛以前，无论是从考古资料还是历史记录都显示辽东、朝鲜半岛与华北地区已经有了人员往来以及华北人口向辽东、朝鲜半岛的迁移活动。首先，通过半岛与齐国有“文皮”<sup>⑩</sup>商贸往来的情况来看，至少在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时期以前，齐国与半岛就有了人员往来交流。另外，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具有中原风俗属性的土坟墓在辽东地区及鸭绿江流域出现，这说明中原人口自发性的移居，以及技术、文明的传播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期间就已经发生。且早在秦始皇遣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2011年，701页。

② 《宋史·蛮夷传三·黎洞》。

③ 从高句丽出自扶余别种，且祀箕子神等史料线索来看，可以看出高句丽与箕子朝鲜存在的关联性。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高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9、5320页。

④ “百济国，其先出自夫馀。”（《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第2217页。）

⑤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3页。

⑥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2页。

⑦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8页。

⑧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9页。

⑨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瑒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9页。

⑩ 李山、轩新丽译：《管子》（下），中华书局，2019年，第1017页。

徐福入海求仙之前的公元前4世纪,齐国的威、宣二王以及燕国的燕昭王就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sup>①</sup>不能排除其中有些人抵达辽东、朝鲜半岛等地。<sup>②</sup>这些人也极有可能携带中原式青铜武器,并有可能帮助“箕子朝鲜”改变了其青铜剑铸造样式。因为从一开始辽东地区出现的细形铜剑就有与中原式铜剑共存的普遍现象<sup>③</sup>,且出土细形铜剑最多的是土坑墓<sup>④</sup>,不同于之前琵琶型铜剑主要出土于石棺墓、支石墓这一情况,再加上考虑到土坑墓的出现有可能是中原人移居的结果,种种现象显示细形铜剑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辽东地区细形铜剑文化向朝鲜半岛内传播时还出现了典型的陶器二重口沿深腹钵形器与黑色磨研长径壶,这说明该时期辽东地区或吸收了更为广泛的新文明,不仅仅只是铜剑铸造形制发生了变化。<sup>⑤</sup>这很有可能是贸易、工匠播迁的结果,即小规模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 三、商周时期“箕子朝鲜”与华北诸夏在东北亚局部地区的迁徙与文化交融

“箕子朝鲜”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稳定发展期后,公元前3世纪初,其宁静被打破。最初燕易王始称燕王(公元前323年)<sup>⑥</sup>,而“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结果“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sup>⑦</sup>。化解了初次的危机。不过仅仅过了几十年之后,在公元前300年左右<sup>⑧</sup>,朝鲜王“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sup>⑨</sup>。从“取地二千余里”一句来看,除了显示出“箕子朝鲜”曾经地域广阔外,还显示出经此一役“箕子朝鲜”元气大伤,被压缩至满番汗以东。郑君雷认为,以满番汗为界就是以此次战争之后修筑的大宁江长城为界。<sup>⑩</sup>

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箕子朝鲜”被限定在以大同江流域与今平壤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内。而在此一时期,细形铜矛与短内式铜矛也一起传入朝鲜半岛<sup>⑪</sup>,这一现象印证了“箕子朝鲜”迁往半岛的事实。被燕国击败后“箕子朝鲜”势力衰微,在大同江流域有可能处于一种孤立状态。此时,更南的汉江尚无活跃的文明迹象,没有出现铁器到来后的细形铜剑后期文化,但是细形铜剑却在更南的地方继续发展(见图1)。这种现象意味着“箕子朝鲜”一小部分族群有可能走得更远,与半岛南部的土著融合。与此同时,在半岛西南部地区还发现了如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遗址出土的中原式铜剑。<sup>⑫</sup>这些铜剑

①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9页。

② 有研究认为由山东半岛与黄海、渤海沿岸去朝鲜半岛的海上航行,可追溯至新石器晚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不仅知道朝鲜之地域所在,沿着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与辽东半岛南岸,海船就很容易驶达朝鲜,且已经能航行到朝鲜半岛南部与东南部。(参见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③ 成璟瑯:《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④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瑯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7页。

⑤ [韩]崔梦龙等著,成璟瑯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9页。

⑥ 彭华认为箕子朝鲜“自称为王”也当在公元前323年,而其“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的军事行动,应在这之后。参见彭华:《燕国八百年》,中华书局,2018年,第232页。

⑦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8页。

⑧ 彭华认为秦开攻打箕子朝鲜,将箕子朝鲜赶至满番汗以东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280年。(参见彭华:《燕国八百年》,中华书局,2018年,第232页。)

⑨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8页。

⑩ 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载《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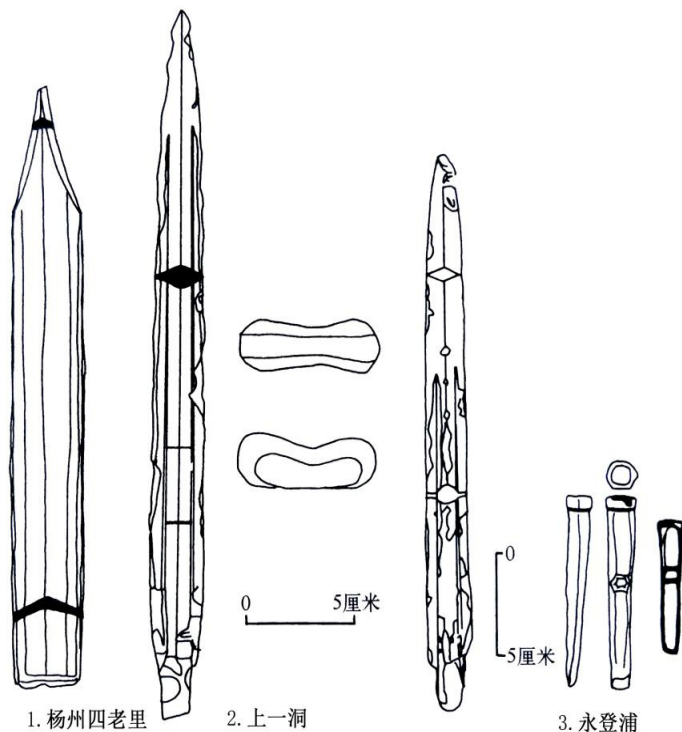
⑪ 成璟瑯:《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⑫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还有人主张是吴越地区传入。(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载《文物》,2015年第8期;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4期。)也有人主张从山东半岛流入。(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07年第8期。)就流入时间,成璟瑯认为战国末年到汉初比较可信。(参见成璟瑯:《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0页。)



在战国中期,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来源于齐国。在半岛上发现的中原式铜剑大约流行在公元前3世纪后叶到公元前2世纪前叶,约半个世纪的时间<sup>①</sup>,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中原各国间残酷激烈且频繁战争,是这些中原式铜剑传到半岛南部的时代背景。据推测,这些中原式铜剑的持有人极有可能是避乱、避难或从海路抵达半岛南部的。<sup>②</sup>不过从既有的考古资料上来看,这些中原式铜剑并没有就此流行起来,因为同时期半岛上还持续存在着变形琵琶型铜剑以及细形铜剑<sup>③</sup>,即持有这些中原式铜剑的中原居民在半岛南部地区属于零星式的流入现象,并没有对当地土著文化产生颠覆性影响。相反,该时期深入半岛南部的少数中原居民很可能渐渐融入了当地土著族群中。

图1 汉江流域细形铜剑期出土遗物<sup>④</sup>



在半岛南部有称为“韩”的土著<sup>⑤</sup>,不过有关记录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如我国最早有关“韩”的记录是东汉时期的《潜夫论》《后汉书》等,《三国史记》最早出现有关“韩”族的记录是在新罗朴赫居世十九年,即公元前39年,史载这年“春正月,卞韩以国来降”<sup>⑥</sup>。有关韩族的构成,一种意见<sup>⑦</sup>认为,韩族由商族、土著民族、周族融合而成。罗继祖认为,商族即箕子一支和随着箕子入海的一批商族遗民,也就是辰韩。周族是北方的韩国被灭于燕后,有一部分人渡海东去三韩中的弁韩。马韩则是由土著组成。还有一种意见<sup>⑧</sup>认为在西周的中后期,北方的貊系部族逐渐向东、向南迁移,与濊

① 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5期。  
 ②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  
 ③ 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5期。  
 ④ 图片来源:[韩]崔梦龙著,成璟瑭译,《汉江流域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2页。  
 ⑤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8页。  
 ⑥ 《三国史记》卷第一《新罗本纪第一》,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⑦ 罗继祖:《辰国三韩考》,载《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⑧ 林坚:《朝鲜半岛的中国移民历史考察》,载《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

人融合形成沃沮、濊貊民族,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濊人融合成为马韩。刘子敏<sup>①</sup>则认为,“三韩”之“韩”的由来与“韩侯之国”土崩瓦解及有一部分人越海前往半岛南部有关。

琵琶型铜剑文化在半岛主要分布在以南海岸为中心的中南部地区<sup>②</sup>,这一现象说明“箕子朝鲜”遗民或受“箕子朝鲜”文化影响的中原居民通过陆路或海路迁往半岛南部。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在战国末到汉初时期,中原文明在半岛西北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南部地区。与半岛南部不同的是,战国末到汉初在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有相当数量的中原式铜剑分布。<sup>③</sup>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在此地区也相对强势。

#### 四、战国时期燕文化对东北、朝鲜半岛西北局部区域的影响

由于地缘原因,相对而言在周文化中,燕文化对辽东地区的影响更为深刻。燕昭王在位期(前311—前279)是燕国最为强盛的时期,史称“全燕”。燕国的领土延伸到半岛西北地区,在辽东设郡<sup>④</sup>并修筑长城。使偏居平壤地区一隅的“箕子朝鲜”臣服,并“为置吏”<sup>⑤</sup>。不过仅约半个世纪以后,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入燕都,燕王喜东迁辽东,旋即在四年后的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sup>⑥</sup>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应是燕国人大量前往辽东、半岛的时期;而公元前226年以后,是燕国贵族、军队大举迁往辽东、半岛的一个时期。秦灭燕后,承燕制在辽东亦设郡<sup>⑦</sup>,进行直接管辖,对半岛居民实施间接管理,使属辽东外徼。在此过程中燕国贵族等燕国人有可能继续向半岛内部迁徙。顾炎武曾指出“六国独燕无后”<sup>⑧</sup>这一现象,是讲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原六国纷纷出现旧贵族势力的抬头,唯独燕国不见有贵族后裔复起的记录。彭华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燕丹散落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等史料推测,燕国并非无后,只是在中原大地基本无后,其宗室后裔远徙半岛<sup>⑨</sup>,其中一部分融入后来的“卫氏朝鲜”;另一部分不为“卫满朝鲜”所容的燕国旧贵族极有可能继续南迁,或以“燕”为姓氏<sup>⑩</sup>。与此同时,铜矛、铜戈等长兵器集中出现在半岛东南地区,且因缺乏实用性而渐渐呈现礼仪化倾向<sup>⑪</sup>等现象。

王绵厚推测燕秦汉时期“辽东故塞”的基本走向由新民公主屯向东,经“乌尔汉”一线过辽河以东,然后东南经沈北财落堡以北一线,经铁岭南邱台和沈阳之间,由蒲河而进入浑河以北。东南行由沈北新乐东,指浑河北岸东陵东山,再延至抚顺方向。经由东陵区“青桩地”重要古城(辽东郡中部都尉)以北,过抚顺望花区高湾烽燧东南行,沿浑河支流拉古河南下,从拉古、海浪一线烽燧址,沿拉古河东南行,延向本溪市威宁营和碱厂堡、赛马镇,然后向东进入宽甸北部的灌水、太平哨以南至大西岔一线,直至鸭绿江西岸,过鸭绿江延展至大宁江长城。<sup>⑫</sup>燕人等华北居民向辽东地区的迁居应该主要集中在此范围内。

① 刘子敏:《朝鲜半岛“三韩”研究》,载《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11辑。

② 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5期。

③ 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5期。

④ “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6页。

⑤ “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中华书局,1982年,第2985页。

⑥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1561页。

⑦ 《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5页。

⑧ 《日知录》卷二十二“六国独燕无后”条,见(明)顾炎武、(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日知录集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37页。

⑨ 彭华:《燕国八百年》,中华书局,2018年,第141页。

⑩ 如后来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就活跃着燕氏家族,是百济国中大姓八族之一。(见《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⑪ 成璟瑭:《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3页。

⑫ 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

随着燕国人开始规模性地向辽东迁移,与原来居住在辽西、辽东的戎族、夷族等逐渐融合,导致随后山戎、东夷等名不再见于史籍。<sup>①</sup>燕人与这些族群的融合之所以如此顺利,原因可能在于原本山戎、东夷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和燕人就比较相近。<sup>②</sup>这种经济、文化的相近性,基于燕国取辽东地之前燕国就与半岛存在着广泛的人员交流。

考古资料显示,最晚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中晚期,东北已有中原铁器传入,分布在辽西地区的袁台子、十二台营子、下辽河流域热闹街等个别遗址。并且半岛的青铜武器文化也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受到了燕文化扩散的影响。在铁器文化流入半岛的过程中,铁器农具比铁质武器出现的更早也更频繁<sup>③</sup>,这种现象说明,这一时期最先是中原农耕居民迁入半岛,或是受燕国铁器文化影响的其他东夷族群迁入半岛,抑或只是单纯的技术输入。总之,在燕国与“箕子朝鲜”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前,两者间已经有了密切的经济、人员、文化交流迹象。

在燕国统治辽东等地区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积极开发当地商业,辽东地区的煮盐业成为燕国的一大产业。<sup>④</sup>因此,在辽西、辽东、半岛等地发现有广泛且大量的燕国钱币、文物等。如辽宁省义县老君堡大凌河岸出土的明刀、安阳币数瓮,大石桥盘龙山附近发现的战国明刀,辽阳太子河附近出土的方足布、明刀币,熊岳北五里厢红旗出土的战国货币方足布、尖足布等<sup>⑤</sup>;锦州大泥洼子出土的明刀币、布币等;沈阳大西门外热闹街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陶盖鼎、盘、壶、匜等<sup>⑥</sup>;辽阳出土了战国虺纹大鼎、“中平城”款铜戈和大批襄平布;旅顺老铁山牧羊城古城出土了明刀钱、一刀钱等<sup>⑦</sup>;辽宁省北票东官营子发现燕王职戈等<sup>⑧</sup>。就地域分布而言只辽宁一地,就分别在辽宁朝阳<sup>⑨</sup>、敖汉旗<sup>⑩</sup>、大连等地出土数量可观的燕国货币。另外,在朝鲜平安南道江界化京面吉多洞也出土了4000余枚燕国货币;在朝鲜渭源崇正面龙渊洞出土了1276枚燕国货币残片(完整者51枚)等。<sup>⑪</sup>可见战国末期辽西、辽东与半岛西北地区、河北地区是一个货币统一的商业活动区域。这种商业交流的一体性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统合。司马迁所记“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馆秽貉、朝鲜、真番之利”<sup>⑫</sup>的场景,正是这种交流与统合倾向发展到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具体情景。

① “战国晚期,中原的燕、赵文化已直达到(今)吉林省中南部和南部。在中部东辽河流域,以(今)四平市梨树县二龙湖古城为代表的战国末至西汉遗存,既含燕文化和汉文化的因素,又有浓郁地域性特色的土著文化因素,是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考古学遗存。”(参见金旭东:《吉林省文物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3年第8期)“随着燕将向东开疆拓土,燕文化的传承者开始大规模进入东北土著民族的活动区域,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促成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达到新的水平。”“燕人修筑长城,需要征发大量的徭役建筑边塞、转运物资,守备防线需要调动相当数量的吏卒,因此在辽东郡建置之初燕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又以军队及其给养保障人员最先进驻。燕人迁入辽东郡后,居民中仍有当地相当数量的东胡、东夷人,经过长期的郡县统治,融合成为边民,共同劳作,极大地改变了辽东地区的文化面貌。”(于凌:《浅议燕秦时期辽东郡边民的构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科版)》,2018年第1期。)

② 孙进己、冯永谦总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③ 成璟璐:《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3页。

④ “燕有辽东之煮。”(见李山、轩新丽译:《管子》(下),中华书局,2019年,第1003页。《管子》所载此句亦可从侧面考证《管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3世纪末燕据有辽东之前。

⑤ 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第63页。

⑥ 金殿士:《沈阳市南市区发现战国墓》,载《文物》,1959年第4期。

⑦ 李文信主编:《辽宁史迹资料》,辽宁省博物馆1962年。(转引自李龙彬:《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及城址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34页。)

⑧ 张震泽:《燕王职戈考释》,载《考古》,1973年第4期。

⑨ 金德宣:《朝阳七道岭发现的战国货币》,载《文物》,1962年第3期。

⑩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老虎山遗址出土秦代铁权和战国铁器》,载《考古》,1976年第5期。

⑪ 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⑫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5页。

## 五、秦朝时期半岛南部人口流动、交融情况

公元前222年,秦王派王贲攻辽东,俘燕王喜,灭燕。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后,始皇使蒙恬筑长城,东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准立。”<sup>①</sup>秦国延续了燕国在辽东地区,包括半岛大宁江长城在内的统治规模<sup>②</sup>,羈縻已偏安一隅的“箕子朝鲜”。<sup>③</sup>大宁江长城的北支辽宁省宽甸县白菜地石墙址和太平哨乡大挂房村出土的秦朝“李斯戈”<sup>④</sup>以及平壤石岩里遗址出土的一把中原式铜剑,与刻有“二十五季(年)上郡守”铭文的秦戈(秦始皇25年,公元前222年)以及一件中原式铜矛<sup>⑤</sup>,都预示着秦朝统一六国后,势力影响范围已经涵盖了“箕子朝鲜”。因此,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素与半岛有着经济、人员交流,且航海技术发达的燕、齐两国为躲避秦吞并之难的旧贵族,以及为躲避秦苛政的一般民众,就会走得更远,以逃出秦朝势力的影响范围。因此,半岛南部地区,尤其是距秦更远的东南部地区则成了一方重要的避难之地。

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第23号墓曾出土过一件通高50厘米、口径30厘米的铜鼎,此外庆尚南道金海市良洞里遗址(东北与下岱遗址直线相隔40余公里)第322号墓也曾出土一件铜鼎和一串包括两颗水晶珠在内的项链。李慧竹通过考证认为,这些物品有可能是一同逃难的齐国亡民中的一些贵族越海带来的,并继而认为山东地区与半岛的人员、文化交流至少在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且由山东半岛直达半岛南部的航路或在战国时期就已初步开辟。<sup>⑥</sup>这些先决条件为随后逃避秦朝苛政的大规模难民提供了便利。

半岛南部三韩中的辰韩就是由大规模秦之亡人组成,马韩割东界地与之<sup>⑦</sup>,所谓东界地应是今半岛东南部地区的洛东江流域,也就是今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遗址与金海市良洞里遗址等所在区域。此地方言词汇迟至三国时期仍有秦语的痕迹,且秦语种类进行细分的话,也应以燕、齐两地为主。<sup>⑧</sup>除了语言上与燕、齐两地存在相似性外,辰韩在其他种种生活习惯、言语风俗上也处处显示辰韩与马韩、弁韩存在不同。辰韩知“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sup>⑨</sup>。而马韩则“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知骑乘牛马”<sup>⑩</sup>。弁韩也与辰韩“言语风俗有异”<sup>⑪</sup>。

另外,辰韩还有“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sup>⑫</sup>的枕骨人为变形习俗,此为三韩中仅见。而枕骨变形又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独特现象,并延续到了龙山文化时期。<sup>⑬</sup>目前,我们不能排除辰韩

①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8—709页。

② 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载《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

③ 《史记·律书》:“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2页。)

④ 王绵厚:《燕秦汉“辽东故塞”诸问题考论——从对〈史记〉一段文字的释读谈起》,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7期。

⑤ 赵镇先著,成璟瑭译:《中国式铜剑在朝鲜半岛出现的背景》,载《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5期。平壤地区出现的这些秦朝武器除了或与秦朝对箕子朝鲜行羈縻之策有关外,也不能排除秦末戍边军人出逃至此,携武器前来的可能性。

⑥ 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载《北方文物》,2004年第1期。

⑦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9页。)

⑧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三国志》卷三十一《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一句说明此地沿用燕、齐两地名词居多,故而将有其他名词来源的情况称为“非但”。

⑨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9页。

⑩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9页。

⑪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0页。

⑫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9页。

⑬ 赵永生、肖雨妮、曾雯:《从人骨材料谈大汶口文化居民西迁》,载《东南文化》,2019年第5期。

的这一风俗与大汶口文化存在的关联性。少昊氏族集团又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sup>①</sup>苗威认为,新罗人自谓少昊金天氏之后,或与西周时期海岱之地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关的夷人渡海前往朝鲜半岛有关。<sup>②</sup>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齐地的一些地区直至秦灭齐国之初还留有枕骨变形习俗,并在秦灭齐之际渡海前往半岛东南部洛东江地区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东南地区,在秦朝时期还与徐福东渡一事相关。徐福东渡一事首见于《史记》,《史记》中有关徐福的记录共有四条,其中三条出现在《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徐福最早的记载出现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首次东巡赴泰山封禅,徐福趁机上书秦始皇,请求带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齐人徐市(市同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sup>③</sup>七年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对徐福等方士求长生药不果震怒,史籍载:“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sup>④</sup>又过两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第四次东巡至琅琊,《史记》记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sup>⑤</sup>同年,秦始皇死在回程的路上,而徐福也最终领“男女三千人,(始皇)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sup>⑥</sup>就《史记》所载内容来看,徐福东渡应该不止一次,且从最后一次所要求的“男女三千人”与“五谷种种百工”来看,足以以为“止王不来”创造充分的条件,这也说明徐福在前一次东渡的时候,已经到过某个让他觉得可以居住的地方<sup>⑦</sup>,只是准备还不够充分。

目前,我国学界对徐福东渡之后的目的地问题存在几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徐福一行去了日本列岛<sup>⑧</sup>;二是认为徐福一行去往朝鲜半岛东南部<sup>⑨</sup>;三是认为徐福一行最终目的地是日本列岛,但是一部分成员留在了朝鲜半岛<sup>⑩</sup>;四是不确定最终去向,对“渡日说”持谨慎态度。<sup>⑪</sup>还有一种主张是徐福一行不可能到达“卫满朝鲜”<sup>⑫</sup>,也即今天朝鲜半岛北部,其主张的根据是《史记》中对“卫满朝鲜”已有详细记载,如果徐福最终到达半岛北部称王的话,就与有关“卫满朝鲜”的记录相冲突。虽然意见多有分歧,但是无论是认为徐福一行最终去往半岛南部或是日本列岛,都很难断然否定存在徐福一行曾出现在半岛南部可能性的这一观点。

通过对韩国民俗学方面的调查,我们发现涉及徐福传说发生地的朝鲜半岛具体地点主要集中在西部与南部沿海,以及全罗南道智异山一带。目前,已知的有关徐福传说流传分布区域也都集中在今天韩国的全罗南北道、庆尚南北道、济州道等南部区域。有关徐福传说的地点最东南方向是庆

① 田继周:《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00—102页。

② 苗威:《论辰韩的民族构成》,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47页。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58页。

⑤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63页。

⑥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6页。

⑦ 周延云等认为,徐福之所以欺骗秦始皇是想长期定居海外,还含有开发海外的因素。日本学者山本纪纲亦持相近观点。参见周延云、宫同文:《建国以来国内外徐福研究述评》,载《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⑧ 参见王颀:《徐福东渡新考》,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文贝武、黄慧显:《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2期。

⑨ 参见王升:《徐福东渡五大问题新论——以〈史记〉与〈山海经〉为线索》,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5期。

⑩ 参见牟元珪:《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从远古到徐福东渡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编:《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225页。

⑪ 参见韩玉德:《徐福其人及其东渡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⑫ 参见文贝武、黄慧显:《论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2期。

尚南道的巨济岛,巨济岛往东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再也不见有任何有关徐福的传说或遗迹的分布。<sup>①</sup>巨济岛距洛东江口、庆尚南道金海市良洞里遗址、蔚山市下岱遗址不远,这种现象显示徐福东渡与朝鲜东南地区秦时移民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 五、结 语

汉代以前,我国华北、东北及朝鲜半岛局部区域人口迁徙与交融,以公元前 3 世纪末燕国东扩为契机,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由箕子所代表的殷族集团对东北亚局部地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改变了以貊族为主的辽河流域各族群的政治、文化面貌。“箕子朝鲜”作为周的侯国,在与华北诸夏侯国的交往过程中,又缓慢地吸收了周人的文化,继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分阶段呈波浪式的由辽西、辽东继而又影响到半岛地区。在公元前 3 世纪末燕国东扩之后,东北亚局部区域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族群、文化融合现象。此一阶段伴随着燕、秦等势力的延伸,不仅在文化上对东北亚局部区域产生影响,在族群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汉代以前,我国东北、朝鲜半岛西北等局部成为华北居民迁徙的目的地,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文化面貌。

从考古资料来看,在公元前 2 世纪初,辽东乃至大同江流域及黄海道地区,土圻木椁墓文化取代此前的石椁墓、瓮棺墓文化,成为该区域文化主体,这意味着汉代以前辽东地区以及大同江流域已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辐射区一部分,中原居民与东北亚部分族群在交往、交流与冲突中逐步交融。汉武帝设四郡后,加速了该地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族群的融合。在半岛其他地区,如东南部地区,也有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原、东北居民的迁徙现象,只不过此后由于缺乏持续性的迁徙活动,便逐渐与当地的其他族群相融合。总之,该时期的相关区域的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的人口移动情况大致吻合。这表明在汉代以前时期,我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局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经由一系列人类迁徙等活动之后,已经出现了族群融合、文化融合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化面貌。

**Abstract** Before the Han Dynasty, some Huaxia ethnic groups in northern China had already stated to move to the Liao River valley in northeastern China. Taking the eastern expansion of the State of Yan at the end of the 3rd century BC as the watershed,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the Yin ethnic group represented by Ji Zi exerted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some parts of Northeast Asia, which chang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various local ethnic groups in the Liao River valley dominated by the ethnic Mordeans. In the second stage, that is, after the eastern expansion of the State of Yan at the end of the 3rd century BC, some areas such as the Liao River valley and today's northwest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became the destination of large scale migration of the Huaxia ethnic groups, which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金洪培,教授,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延吉,133002;冯英盾,讲师,平顶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平顶山,467000)

[责任编辑:邓颖洁]

<sup>①</sup> 金洪培、冯英盾:《叙述与记忆:朝鲜半岛文人的徐福东来记事研究》,载《史学集刊》,2022 年第 2 期。